浓浓上海闲话 惟有新民晚报

“给水站”个记忆

文/费平

老里八早

提起上海,大家侪会搭“石库门”联系起来;讲到大杨浦,又会得联想到“棚户区”;而“棚户区”里一道独特个风景,就是“给水站”了。

“给水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为解决上海边缘区域个劳动人民吃水用水而生成个产物。辩些地区因为产业工人聚集最多,所以伊个历史因素造就了交关“穷街”。辩个辰光,阿拉居住个“穷街”居民用水侪要到百米外个“给水站”去挑。当时每家人家必勿可少个家生就是水缸了。记得“给水站”就是两只蛮大个水龙头,龙头上套了黑橡皮管。水龙头旁边还有一只约5米长、3米宽个水池。每日早浪,管“给水站”个大妈先要拿水池灌满,以备人多来勿及候水,就可从池里舀水。

我9岁辰光姆妈病故,跟爹爹相依为命20多年。呒没姆妈个小囡,促使我从小就挑起了当家理财个担子。爹爹上班,家务侪落拉我身浪,其中之一就是每天到“给水站”挑水。勿到10岁个我因为力气小挑勿动,就用钢宗镬子一趟一趟端到屋里倒拉缸里,再大一点就半铅桶半铅桶拎,上中学后我就用扁担挑了。为了避开排队,我经常一早等到5点一开放就去挑,有辰光来勿及就直接垃拉水池里舀。为了减轻挑水个繁重,居民垃拉用水量大个情况下就直接去“给水站”用水,譬如汰被头、床单或者十多件衣裳,就带了大脚盆、搓板、肥皂等垃拉“给水站”边浪洗汰。过年前个寒冬腊月,爹爹背佝拉海,垃刺骨个凉水里汰被头个场面时常印了垃我个脑海里。后首来我也逐渐垃拉礼拜天拿爹爹搭仔我换下来个龌龊衣裳拿到“给水站”去汰。热天介去“给水站”恣冷水浴是每日夜快头必做个一桩事体,男人搭仔小人穿仔短裤坐垃大个木盆里,搨完肥皂,端起木盆从头浪浇下去,再去放盆水……辩个辰光用水计费勿晓得一立方多少钞票,只晓得一角洋钿买12根大筹码,一根大筹码等同4根小筹码,一铅桶水收一根小筹码。买筹码还有“激励机制”,两角洋钿一买可拨25根,于是人口多个人家侪是两角一买,阿拉屋里人少,有辰光一个月12根筹码也用勿完。一把浴,只需两根小筹码。有辰光我跟同学垃拉附近个河浜里向游完泳,也勿回去拿木盆,乘“给水站”呒没人用水个辰光,就直接垃拉水龙头下冲洗,还美其名曰“淋浴”。

八十年代中期,阿拉告别了给水站,政府为每户居民拿自来水接到屋里向了。记得辩天拆除“给水站”辰光,我个心情特别复杂。看伊挂了30多年虽已生锈但字迹清爽个“上海市人民政府给水站”个搪瓷铭牌搭辩个已生青苔个木水舀,我搭仔邻居们是既勿舍又欣喜。我还专门为电台“滑稽王小毛”节目创作了广播小品《水终情深》。

是啊,毕竟“给水站”与阿拉朝夕相处几十年,突然消失了又交关怀念。但社会垃拉发展,阿拉何尝勿感恩时代个变迁呢?

亦君/画

南京西路曾名“静安寺路”

文/宜青

沪渎码头

1862年,今朝西藏中路以东个辩块地方,老早叫第二跑马场,当时因地价大涨,跑马总会拿伊卖脱,再垃拉今朝个人民广场搭人民公园个地址浪,造了第三跑马场(习称为“跑马厅”)。同时垃拉辩个辰光,总会垃拉伊个北边,东与南京路相接,越出租界范围向西开辟了一条跑马道,远通上海名胜静安古刹。迭条路英文以静安寺老早个著名个名字“涌泉”命名,叫“涌泉路”(Bubbling Well Road),中文则因为“静安寺”个缘故被习惯叫为“静安寺路”。

静安寺路辟筑后,原先空旷清静个城郊乡野,成了马蹄奔腾、马车驰骋个游乐道,尤其是夏夜辰光,一路凉风习习,交关人拿辩搭作为上海个一条避暑道。静安古刹也因辩条路个辟通,香客游客日增,香火大为旺盛。1899年公共租界第三次大扩张,西边界线正好推进到静安寺,静安寺路遂渐拨拉正式纳入租界范围。外商、华商陆续进入里向,开设各种有特色个商号,还购置土地营建洋房搭新式里弄。海上闻名个张园搭仔爱俪园(哈同花园)先后垃拉路段中兴造,其规模跟新奇为上海滩之最。又有夏令配克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仙乐斯舞厅、大都会花园舞厅等游乐场所垃拉迭搭出现,其水准侪属上海一流。1934年,“国际饭店”垃拉东段跑马厅对面拔地而起,当时是上海最高个高楼,成了旧上海城市达到极度繁荣个一大地标。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静安寺路跟东边个南京路直接贯连,两条路分别拨拉更名为南京西路搭南京东路。

上海闲话创版100期发言选登

说沪语·写沪语·沪语文学

发言者/郜元宝

《新民晚报》创办“上海闲话”专版,为保护沪语做了件有意义的事,也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汉字、方言与文学这些又老又新的问题。

上海人不仅有权利在某些场合讲沪语,还要讲得好,讲得正宗,这个大家都谈得很充分,不会有什么疑义。

但有时方言权利不可让渡,有时又不得不适当地让渡,比如在“推普”的场合。如今有多少“农民工”和“外地人”让渡了与身居来的方言?上海人到了国外和“外地人”讲普通话不也很亲切吗?如果到了既非汉语又非英语的国家,能用英语交流也会很高兴呢。可见方言和人的关系不能看得太死,好像离开方言就一无所有。

普通话也并非空中楼阁,它在方言基础上形成,只是和某些方言近一些而和某些方言远一些罢了。对有文化的上海人来说,现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隔膜了,至少不会彼此对立。“说沪语”天经地义,“说沪语”的限度也一目了然。

怎样“写沪语”?粤语基本有一套书写系统,一部分广东人能看懂,外地人(包括不识“粤字”的广东人)如读天书。“写沪语”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所谓“写沪语”,主要是为沪语中的独特语汇确立合适的字符,但更多和普通话相通的沪语发音上的“大同小异”还是写不出来。如果照顾沪语发音与普通话的系统差异而去寻找匹配的文字,势必又要和粤语书写走相似的道路。

中国文化现代化方案之一,就是用统一的汉字写统一的国语。这个方案今天并未结束。在这意义上,现代作家对待方言的经验值得借鉴。假设鲁迅不用国语而用绍兴话写《阿Q正传》,懂绍兴话的人也许过瘾,广大读者却会叫苦不迭。被胡适之、张爱玲等大肆吹捧的吴语文学杰作《海上花列传》名气不小,但又有几个读者?作家用方言写作过了底线,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对现代文学书面语贡献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而是南方文人,后者主动放弃“方言权利”,逼迫自己去学习、去创造“南腔北调”、“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文学的国语”。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茅盾、丁玲、沈从文、钱钟书放弃了“方言文学”的诱惑,坚持用“文学的国语”来“翻译”方言,非但没有丢失反而发扬广大了方言的文化特性。

吴组缃先生有篇文章叫《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认为方言灵活多变,有限的汉字无法忠实地记录。他建议放弃这个理想,转而发掘汉字本身的可能性。这后一点,即如何通过“文学的国语”把方言的奥妙输入文化共同体,恰恰是许多作家所欠缺的。我们不仅缺乏适当的记录方言的汉字,更缺乏对汉字和共通书面语的把握。有“沪语危机”,不是更有“母语危机”、“汉语危机”吗?

讨论方言不能局限于某一方言人群,要扩大开来,变成大家可以关心的普遍问题,否则不仅对方言以外的人意义不大,也会画地为牢,误导方言人群。

上海闲话的话与字

文/马尚龙

侬讲伊讲

实际上有两种“上海闲话”。一种是平常大家在讲的上海闲话,生活化的,一种是有尖音团音的上海闲话,像“阿福根谈生产”,算是标准化的。从生命力上讲,当然是生活化的上海闲话更加会获得年轻人的认同,但是生活化的上海闲话没有得到专家足够的关注。

上海闲话有了相应的文字,是不是标准答案暂且不说,另外有一个问题,当这些上海闲话的文字嵌入在普通话文字中后,两种字之间缺少了能够贯通的气息,上海闲话的字显得突兀。一方面这些字有点冷僻不常见,另一方面,普通话的文字经历过了两次简化字的过程,笔画不多,上海闲话的字都是“原生态”,大部分笔画繁多,所以两者间缺少统一性,如果再要加上注音,那就更加有了阅读的距离。这是需要文字专家解决的问题。

沪语歌谣

祝《新民晚报》越办越好

创作/任丽清

新民晚报
夜饭吃饱
看好夜报
豪燥睏觉
一觉醒来
精神老好
样样事体
做得周到